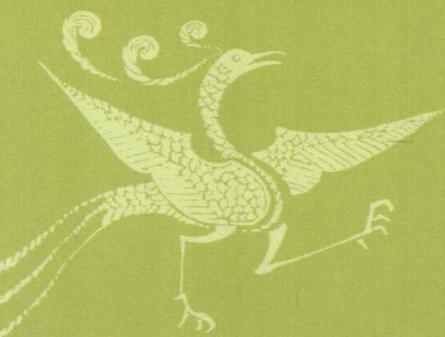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王世贞文学研究



书
名
波
著
学
本
书
从
文
学
政
治
史
宗
教
文
化
诸
因
素
出
发
，
重
点
剖
析
了
王
世
贞
在
文
学
思
想
与
创
作
上
的
特
色
与
成
就
，
揭
示
其
文
化
心
态
与
审
美
心
态
发
展
的
内
在
脉
络
，
强
调
了
王
世
贞
在
明
代
文
学
史
上
的
独
特
地
位
和
价
值
。

中华书局

王世貞文學研究

邴 波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世贞文学研究 / 郦波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1.12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8427 - 6

I . 王… II . 郦… III . 王世贞(1526 ~ 1590) — 文学
研究 IV .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690 号

书 名 王世贞文学研究

著 者 郦 波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 任 编辑 俞国林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7 1/4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427 - 6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诗歌创作论	31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乐府诗创作	33
第二节 从“刻意老杜”到“不必尽宗”的五言律诗创作	46
第三节 “凝重”与“流动”的七言律诗创作	53
第四节 篇法、句法、字法与王诗的“格调”美	62
第五节 “善学”与“诸体皆备”的诗歌创作风貌	71
第二章 散文创作论	85
第一节 学者型的散文创作风格	86
第二节 严谨缜密的论说文创作	95
第三节 宗法《史记》、写人风神的纪传文创作	101
第四节 情景两胜的游记文创作	112
第五节 中矩合度的应用文创作	121
第六节 时见性灵的小品文创作	129
第三章 文学思想论	139
第一节 复古理论的形成与“后七子”的结盟	140
第二节 复古理论的集中表现——《艺苑卮言》	150
第三节 “文必秦汉”与“诗必盛唐”	164
第四节 “性情”说与复古论	178
第五节 雅、俗交融的戏曲理论——《曲藻》	192
第四章 政治与文学	201
第一节 家族影响与王世贞文学观、政治观的初步形成	202

第二节 严、王之争与王世贞的文学命运	219
第三节 与高、张之隙及王世贞的“晚年定论”	239
附录一 王世贞简谱	255
附录二 王世贞作品年表	265
主要参考书目	277

绪 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明代文学,尤其是对明代以诗歌、散文为代表的雅文学的发展历史逐渐有了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发现湮没在明代俗文学耀目光辉下的有关诗、文等雅文学体裁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依然是一座有待开掘的文学宝库。其中的成就或许并不像闻一多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说的那样——“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①就明代诗文而言,若依闻一多先生语,“挣扎”或也形象,“无味”实则未必,于“挣扎”中独得其“味”倒正是明代雅文学的特色之一。

对明代文学进行再认识,王世贞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为鲜明而又典型的个案。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又号弇州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实际领袖之一,主盟文坛二十年,为明代中后期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②,中有文艺理论专著《艺苑卮言》八卷^③,《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④,《读书后》八卷,《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后门人杨汝成会同陈继儒辑录《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及《弇山堂别集》中的

①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1册《神话与诗》第203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今存《弇州山人四部稿》有明万历世经堂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据明万历世经堂刊本。

③今存《艺苑卮言》有清光緒年间玉尺山房刊本、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本文据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

④今存《弇州山人续稿》有明崇祯间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据明崇祯间刊本。

史料，编为《弇州史料》一百卷^①。其一生著述之富，鲜有人及，涉及文学、史学、宗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且曰：“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②但同时《提要》也云其“负其渊博，或不暇点检，贻议者口实”。事实上，这正是后人对王世贞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提要》所云，其作如“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楷淆杂”。王世贞的创作既以繁富称，未免泥沙俱下，以至瑕而掩瑜，这集中体现在应酬文学的创作上。检寻《弇州山人四部稿》及《弇州山人续稿》，可以发现在数百万字的文学创作中，诔铭、赠序、行状、墓志等应用文体的创作占了《四部稿》及《续稿》创作总量的一半以上，而这些大多都是请托、应酬之作。王世贞自己于中年时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曾慨叹说：“玉案有无知莫较，银钩早晚竟难虚。”^③到了晚年，他亦“深自悔之”，多次表示要“拒一切应付之作”^④，要“第一先教笔砚尘”^⑤，却又终究不能免俗。这就是造成屠隆所说的王世贞“撰著太多，篇章太富……无乃伤于杂乎”^⑥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地来看，虽然王世贞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言之有物、体大精深的风格特色，但那些千篇一律、格套陈旧的应酬之作毕竟表现出较大的规模，并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⑦这样，也就使得后人对王世贞文学成就产生了某些误解。

除应酬之作外，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影响了人们对王世贞的认识。

一是“后七子”宗派的负面影响。所谓成败相因，作为后七子文学

^① 其中又分为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九月闭关谢笔砚，而千里故人讯问不绝，又多以诗及者，遂成此二律志苦且代答》其一，《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

^④ 《答张肖甫司马》，《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四。

^⑤ 《将断文字缘作此》，《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七。

^⑥ 《与王元美先生》，《由拳集》卷二四。

^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

复古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后期的领袖,王世贞无疑是因“后七子”文学运动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这一状况同样也适用于后七子的大多数成员。《明史》称后七子“诸人多年少,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子之名播天下”^①。事实也正如《明史》所言,七子多年少,在结盟前俱无太大的影响,尤其像王世贞等人,在文坛上既属新军,又乏建树,正是七子派的结盟为他们的崭露头角提供了舞台。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人也俱因“后七子”而“名播天下”。后七子中的每一个成员实际上都是与后七子文学流派的发展、成败休戚相关的。这一点在王世贞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乃至很多人很难以公允的眼光看待他。平心而论,王世贞早年“大历以后书勿读”^②的观点确实对李攀龙名为复古、实则泥古的诗文主张起到了鼓吹的作用,并对后七子在诗文理论体系上的先天不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自公安、竟陵出,前后七子备受攻诋,作为与李攀龙并称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而且王世贞早期的理论观点也确实贻人以口实。再加之后来文坛盟主的地位,使他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后七子因偏颇而失当的理论责任,并最终成为备受后人攻诋的主要对象。最具代表性的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的论述。钱谦益评王世贞“晚年定论”,名扬实抑,钱钟书先生对此指陈最力,指出钱谦益易王世贞语“始伤”为“自伤”,足见出“牧斋排击弇州,不遗余力,非特擅易其文……窜改弇州语,不啻上下其手”^③的本来面目(详论见第四章第三节)。事实上王世贞一生“多历情变”^④的经历,“师匠宜高,据拾宜博”^⑤的主张,使他在中年后能间有自省,有所转向,呈现出与早期复古有所不同的某些新气象,这却是多数攻击者在攻其一点时所不愿提及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这一点时说:“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虚骄恃气,持论遂至一偏。又负其渊博,或不暇点检,贻议者口实。……然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⑥

①《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传》。

②《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传》。

③《谈艺录》第38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一评王世贞语。

⑤《艺苑卮言》卷一。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

二是王世贞在俗文学方面的认识与创作情况影响了后人对他的整体评价。这几乎是近代以来影响王世贞文学成就评价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明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不是来自于传统的诗、文、词、赋，而是来自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共识。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不能在俗文学领域有所成就，就很难确立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超群地位。所以，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吴晗对王世贞作《金瓶梅》说进行否定以及七十年代人们对王世贞作《鸣凤记》说重新提出质疑与否定后，明清以来王世贞作为有明一代大文学家的形象也随之淡化，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因此下降。

客观来说，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王世贞自身模糊的俗文学表现。明代小说与戏曲的两朵奇葩《金瓶梅》与《鸣凤记》虽盛传为王氏所作，但在他自己的其余作品中却找不出一句有关创作《金》《鸣》的印证，甚至迄今尚未发现一句有关这两部作品的论述，虽然史料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与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或传播一定产生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详见后文论述）。我们所能明确的他在俗文学领域的表现，一是一部明人尚为重视的戏曲理论之作——《曲藻》，一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艳异编》。但前者虽然为时人所重视，却带有典型的文人说戏、隔岸指点的习气，所以不无缺陷，总体成就难以夸大。而后者又只是王世贞辑录、编选志异、志怪之作，体例、内容俱无超越，也就更为后人所忽视。据此，后人怀疑其在俗文学领域的表现以及由此怀疑其在明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王世贞在俗文学史上地位尴尬的原因，固然有史料的匮乏与不支持，但更为重要的根源是来自于王世贞自身重雅轻俗的俗文学认识。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了王世贞贬低俗文学创作的只言片语，而是纵观其一生文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发现了他产生这一偏颇认识的现实与必然。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岁的王世贞考中进士，留京任职，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京师生活。正是在这一阶段，王世贞真正登上了文坛，并崭露头角，开始了辉煌的文学生涯。这一阶段又是其文学观念的正式形成时期（详论见第三章第一节），即后七子结社初期。这一时期有四点值得注意：一、王世贞受李攀龙的影响，全面接受了复古的文学主张，并对以往自发形成的某些文学观念有所摒弃，而这其中的复古就是诗文的复古，是雅文学创作的复古。二、由于后七子的结社，使得作为新进士的政治使命感和作为文坛新军的文学使命感都得到急剧膨胀，少年以来所形成的“求治”观加使命

感促使其在后七子运动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枢纽作用,而雅文学作为正统文学观念的根本,无疑成为其文学“求治”的阵地所在。三、复古即为革新,矛头所指,在当时无疑包括了以诗文娱主、粉饰升平的台阁文学,只有在相同的创作阵地——即雅文学的创作上,才可能表现出复古以革新的针对性来。四、明代俗文化与俗文学的发展中心此时已自北南移,王世贞虽属吴人,但其文学思想全面形成却产生于仕京的十年间,而此时的北方文学正是以传统雅文学为主的局面,身处这样的创作环境之中,王世贞自然将创作的绝对精力放到了诗文的世界里来。由此不难理解,在其煌煌数百万言的著述中,王世贞为何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形式会惜墨如金,所评甚少。即使是四部稿中硕果仅存的《曲藻》,也只是诗文理论专著《艺苑卮言》的一卷而已。后人虽辟之单独成章,却已非王世贞的本意。当然,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其必无小说、戏曲的作品创作(事实也不一定如此),但我们却可以推断出其对雅、俗文学的不同态度,并因此联想到其可能具备的对自身俗文学创作加以隐晦的特殊习惯。虽然只是联想,却对我们客观而历史地认识王世贞不无裨益,这不正是文学研究的使命所在吗?

创作繁富、泥沙俱下的实际表现,成也“七子”、败也“七子”的宗派影响,以及自身模糊的俗文学认识与表现,是造成后人对王世贞文学成就产生误解的三个重要原因。就这三个方面来看,并不构成导致绝对贬低王氏文学地位的逻辑关系,因此,也就有了对王世贞进行再认识的客观必要。

一、王世贞诗文创作与理论的成就

如前所述,对明代文学进行再认识,很大意义上表现为对明代雅文学成就的再认识,而其中王世贞的成就与表现则尤其值得深入挖掘。

首先,对于前代雅文学传统,尤其是诗文创作方面,王世贞是有明一代最为全面的学习与继承者。

我们说王世贞是有明一代最为全面的学习与继承者,而非“之一”,是经过比较探究而得的结论。明代文学的鲜明特色首先表现在文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上。由于传统文学领域创作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在创作难以突破的情况下,理论的归纳、阐发乃至论争遂有大行

之势。在这一过程中,对前代文学传统的重视与探究是整个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明初宋濂论诗云:“诗之格力崇卑,固若随世而变迁,然谓其皆不相师可乎?”^①正是因为发现了文学发展过程中前后传承的历史内因,作为文坛领袖的宋濂才在明代文迹萌动之初提出了“师古”的理论主张。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师古”与“师心”作为两个对立的重要范畴贯穿了明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历史。因为是否需要“继往”而导致的如何“开来”的分歧贯穿了明代文学的发展,而以前后七子为主的复古派正是希冀借“继往”以“开来”的文坛主流。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数次重大的复古运动,在当时都左右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不论是陈子昂倡导的唐诗复古运动,还是韩愈领导的中唐古文运动,抑或是欧阳修导夫先路的北宋诗文运动,都在复古的旗帜下取得了革新的实绩。复古只是手段,革新才是目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学实绩,我们才称其促进了文学历史的发展。事实上,明代复古运动的初衷也不外如此,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力倡复古,认为学术的最高境界是“积久而用成,变化叵测矣。斯古之人所以始同而终异,异而未尝不同也”^②。同、异间的实质正在于求变。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认为每位作家都应“拟议以成其变化”^③,就连在复古过程中较为极端的李攀龙也是主张“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④的,同时他还有“不朽者文,不晦者心”^⑤的明确主张,而王世贞的“师匠宜高,捃拾宜博”^⑥更是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文坛宣言,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强烈的文学使命感和并非落后或保守的文学历史观。可惜的是,前后七子运动的愿望与结果并不一致,他们的文学复古非但没能开创崭新的文学创作天地,反而落进了因“复古”而“拟古”进而“泥古”的泥潭。但不论结果如何,他们因复古而“继往”的过程依然具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在对前代诗歌、散文创作传统的学习与继承上,前后七子的表现尤其引人瞩目。

有明一代的复古潮流源于明初,最盛于前后七子,七子诗文创作

^①《答张秀才论诗书》,《文宪集》卷三七。

^②《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二。

^③《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三二。

^④《古乐府序》,《沧溟先生集》卷一。

^⑤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引李攀龙语,检《沧溟先生集》中并不见其语。

^⑥《艺苑卮言》卷一。

以“复古”为宗，其中王世贞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一点从后人对王世贞的论述中可以充分看出。后人评论王世贞，多云其“大”、“富”、“赡博”，如屠隆称“元美诗富而大……若以元美之赡博，加之于麟之雄隽，何可当也？”^①胡应麟称“琅邪之大，足可雄视千古”^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③。沈德潜则称“弇州天分既高，学殖亦富，自珊瑚木难以及牛溲马勃，无所不有”^④。“富”、“大”、“赡博”都是讲王世贞创作的丰富，但创作丰富的源泉却是来自于他所学内容的丰富。对于在诗文上所宗法的对象，王世贞曾自言道：

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益日夜置心焉。^⑤

事实上，这段话只是其“宗汉崇唐”说的具体化，其自身的学习却远不止此。以其七言律的学习为例，胡应麟评曰：“（弇州）总萃诸家，则有初唐调，有中唐调，有宋调，有元调，有献吉调、于麟调，其游戏三昧，则有巧语，有诨语，有俗语，有经语，有史语，有幻语。此正弇州大处，然律在开元轨辙，不无泛澜。读者务寻其安身立命之所，乃为善学。”^⑥从这一段评论可以看出，元美的“大处”，一在于学习的广泛，不仅有对前人的学习，甚至也有对时人的学习；二在于善学，既有“泛澜”，又有“安身立命”的所在。打开《四部稿》和《续稿》，这种情况将看得更为清楚。以乐府诗的习作为例，拟古乐府之作即达二百二十九首之多。再以其五言古体为例，《四部稿》卷九全为拟古之作，且每篇皆标明所学某人某体，自汉魏六朝至隋唐，达七十篇之多，足见王世贞在学习摹

①《论诗文》，《鸿苞节录》卷六。

②《诗薮续编》卷二。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

④《明诗别裁集》卷八。

⑤《与张助甫书》，《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一。

⑥《诗薮·续编》卷二。

拟上的用功之勤。对此，胡应麟尤为钦佩，论其诗作云：“《弇州四部稿》，古诗枚、李、曹、刘、阮、谢、鲍、庾，以及青莲、工部，靡所不有，亦鲜所不合。歌行自青莲、工部以至高、岑、王、李、玉川、长吉；近则献吉、仲默，诸体皆备。每效一体，宛出其人，时或过之。”^①“宛出其人，时或过之”是对王世贞学习状态的最好评价，是王世贞“多学”而“善学”的必然结果。所以，屠隆评王世贞在诗文上的学习与创作说：

读《弇州集》，魁瑰巨丽，和畅雄俊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观玄造焉。其为文，包罗《左》、《国》，吐纳《庄》、《骚》，出入扬、马，鞭箠褒、雄。其为诗，炼格汉魏，借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坛李、杜，诚天府之高华，人文之鸿巨，作者之极盛矣。观止矣。^②

虽穷词谀响，却也是据实而论。就雅文学传统的学习规模而言，王世贞的继承性创作虽非后无来者，却也足称“观止”了。

其次，在现实主义创作领域，王世贞是有明一代最伟大的乐府诗人之一。

明初，文坛领袖、“国初文臣之首”宋濂再倡文以载道宗经之说，以为“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③，“斯文也，至人得之，则传之万世为经”^④。其后，雅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渐入理学的桎梏。明初百余年内，操文章贵贱之权，尽是台阁公卿的专利。台阁体盛行前后，虽标榜“风”“雅”，却少其实。就连茶陵派的领袖李东阳也“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⑤。有些诗还常为“堕马伤足”、“鱼瓶遂坏”、“猫忽被踏以死”等类事件而作。李东阳尚如此，余人可知。其间，虽有沈周、吴宽、文徵明、唐寅等吴中派作家起而抨击理学，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有“溪风渚月，谷霭岫云，形迹若空，姿态倏变。玩之而愈佳，揽之而无穷”^⑥的倾向，吟弄风月，虽也“随物赋形，缘情叙事”^⑦，但对自我性情

^①《诗薮·续编》卷二。

^②《与王元美先生》，《由拳集》卷二四。

^③《徐教授文集序》，《文宪集》卷二六。

^④《文原》，《文宪集》卷二六。

^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

^⑥此为吴宽评沈周的创作状态语。《石田稿序》，《瓠翁家藏集》卷四三。

^⑦此为吴宽评沈周的创作状态语。《石田稿序》，《瓠翁家藏集》卷四三。

的关注却大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一点在明后期的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得比较充分。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的巨大影响迅速从思想界渗透到文学界，其“心外无物”、“心即理”的观念启迪了晚明文学个性自觉时代的来临。唐宋派首先秉其风绪，强调主体创作精神，以所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千古只眼”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最重要标准^①。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他们的诗文创作表现出俗化的倾向，于诗于文，却各有得失。在散文的创作上较为成功，甚至更促进了唐宋派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但在诗歌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就表现得薄弱了很多，许多作家甚至表现出强烈的理学倾向，其内容空泛处，实无足观。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尤长于小品文创作，美则美矣，却大多属于“自适”的文字。其后竟陵派力倡“幽深孤峭”，从其所追求的美学风格上也可以看出其创作意境的偏狭之处，因此也不难想象其创作视野的狭隘。何良俊论明人文风说：

夫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之为文者，其质离矣。夫去质而徒事于文，其即太史公所谓务华绝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言曰：“寄兴非远而肇悦其辞，持论不洪而枝叶其说。”以此言诗与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学文者之针砭耶。^②

“去质而徒事于文”确实是明代雅文学创作的通病。在这一方面曾经力图有所改变的，当首推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前七子的出现标志了明代文坛操文章贵贱之柄的下移；前后七子的文学命运大抵与激烈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有南倭北虏的无穷边患，内有连年不断的农民起义，以及武宗、世宗朝的政治混乱，是前后七子运动的时代背景；粉饰升平、言之无物的台阁体文学是前后七子运动批判现实的文学诱因；“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高目标举则体现了七子运动超迈横绝的精神与勇气。正是在种种合力下，他们不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也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力图抒写出文学的光辉篇章。所以，廖可

^①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② 《四友斋丛说》卷二三。

斌先生才说：

就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对腐朽黑暗势力的批判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而言，复古派作家不仅超过浙东派、江西派（台阁体）、茶陵派、道学家诗派、唐宋派等，也超过后人所称道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明代诗文领域内，复古派创作乃是现实主义的主流。^①

应该说，这一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但可惜的是，在复古理想与现实创作的错位面前，前后七子托古以言志的继承与学习演变成了备受后人攻诋的“剽窃”与“模拟”，而流泛于形式、捉襟见肘却也是七子群体难以掩饰的通病。其中能于模拟之外更进一步，取得明确而显著的文学实绩的，当首推王世贞的乐府诗创作。

对于王世贞乐府诗的成就，胡应麟最为推崇，其说也大多中的。如：

乐府自晋失传，寥寥千载，拟者弥多，合者弥寡。至于嘉、隆，剽夺斯极。而元美诸作，不袭陈言，独契心印，皆可超越唐人，追踪两汉，未可以时代论。^②

（元美）乐府随代遣词，随题命意，词与代变，意逐题新，从心不逾，当世独步。^③

虽然胡应麟对王世贞的评论多有谀辞，但他对王世贞乐府诗的评论却是比较客观而公正的。他曾就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曹植逊于曹操、曹丕说而议论说：“《卮言》谓子建誉冠千古，实逊父兄，论乐府也，读者不可偏泥。”^④的确指出了王世贞所作评论的关键，也的确反映出了曹氏父子的短长。可见他对王世贞在乐府诗上的成就是有着深入的研究。

^①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4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按：唐宋派也应属于复古派作家群。

^② 《诗薮·内编》卷二。

^③ 《诗薮·续编》卷二。

^④ 《诗薮·内编》卷二。

究与了解的。

从胡应麟的评论里我们不难看出,王世贞的乐府诗之所以能够“超越唐人,追踪两汉”而“当世独步”,其最主要的成就表现在对乐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手法的继承和发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乐府摹写现实的精髓。曹操借乐府旧题以写时事,苍劲慷慨,给人以全新的时代感受。杜甫自创新题,因称“诗史”。白居易倡新乐府运动,即事名篇,其“为时而著”、“为事而作”^①的主张,正是乐府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的继承。王世贞生活在江河日下的明代中叶,国难家恨无时不在撞击他正直而又忧患的心灵世界,宵小弄权,报国无门反遭迫害的惨痛现实更让他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的丑恶与狰狞。在大量的学习与继承之后,“不袭陈言,独挈心印”正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必然表现。其代表作《乐府变》固然是“不袭陈言”的典型之作,就连其大量仍旧题的拟古之作,也多能有感而发、因切时事,并不受形式的约束。对此,王世贞自言:

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治《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及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饶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②

可见,王世贞自身也经历了由形式模拟到得其精髓的认识过程。“奇旨创造”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正是“天地间一种文字”的意义所在。基于这样的认识,王世贞才采取了“随代遣词,随题命意,词与代变,意逐题新”的“即事名篇”的创作方法,从而真正达到了“从心不逾”、与时不违的创作境界。《乐府变》即是这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成功运用后的杰作。属于“即事名篇”的共二十二首,出于政治原因,有十首是在《弇州山人续稿》中才得以刊行的。其中如《袁江流钤山

①《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

②《书李西涯古乐府后》,《读书后》卷三。

冈当庐江小妇行》^①、《太保歌》^②等篇章都表现出对封建权贵腐朽本质的深刻揭露与批判，俱是久为传颂的名作。放眼明代诗坛，还没有哪一组诗能像《乐府变》那样大胆而深刻地对封建权贵进行揭露与批判，并获得艺术上的成功与超越。因此，认定王世贞是有明一代最伟大的乐府诗人之一，恐怕并不为过。

再次，作为明代古文大家，王世贞在散文创作上体现出了风格独具的面貌。

平心而论，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理想本身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就像吴承学先生所说：“汉唐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时代的文人心灵自由、活泼和健康，其文学艺术则宏大、雄壮、崇高。前后七子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独自拈出秦汉文、盛唐诗，他们的审美判断是相当高超的。”^③本质上看，正是由于这一文学理想的合理性，前后七子影响所及才在明代中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王世贞也正是受这一理想的诱惑才投身于复古运动的。王世贞在回忆受李攀龙影响而启萌复古思想时说：“世贞二十余，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麟，大悔，悉烧弃之，因稍剗削上下，久乃有所得也。”^④所得者何？王世贞自言：“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⑤可见正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理想使他做出了“羽翼”李攀龙而“鼓吹之”^⑥的文学倾向的选择。在这一文学理想的影响下，王世贞在对秦汉文的学习上用力最勤，成绩也最为显著，不仅在理论上是七子群体中对秦汉文研究之最力者^⑦，而且在实践上融汇古今，成为了明代散文创作的大家。

对于“文必秦汉”的认同，在王世贞，是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历史的认识。在总结散文的历史发展时，王世贞说：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

^①《弇州山人续稿》卷二。

^②《弇州山人续稿》卷二。

^③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第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

^⑤《艺苑卮言》卷七。

^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按察攀龙》。

^⑦此说可参见陈书录《前后七子研究》第25—2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